

两战期间法国移民同化问题探析

谢璇娟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法国移民同化问题的解决不仅取决于移民群体本身的决心, 更多地取决于法国社会对移民群体的态度。两战期间法国移民的同化问题第一次被当作“问题”提出来, 其根源在于法国社会对待移民群体的态度。

关键词: 两战期间; 法国移民; 同化问题

中图分类号: K5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743 (2007) 04-0036-03

Study of the Assimilation Issue of French Immigrant in Interwar

XIEXuan-ju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 The resolution of the assimilation issue of French immigrant does not only lie on the ambition of the immigrants, but also more on the attitude of French society. In the interwar, French immigrant issue was the first time put forward as an “issue”, the main reason of which lies on the French society attitude towards the immigrants.

Keywords: interwar; French immigrant; assimilation issue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头巾事件”(1989 年 10 月份, 就读于离巴黎北部 50 公里的克黑 (creil) 的国立学校的 3 个北非裔的女学生, 因坚持佩戴伊斯兰式的头巾上学被校方开除出学校, 从而引发了法国社会各界对此事件的争论。2004 年 2 月, 法国国民议会通过被称为“头巾法”的法案。该法案禁止在学校佩带任何明显宗教标志, 包括伊斯兰头巾、大十字架和犹太人的小帽等, 目的是为了维护法国的世俗政体, 防止教育场所受到宗教干扰。)使得北非移民, 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同化问题凸显。无论是西方学术界还是我国的学术界基本上都认为法国的移民同化问题是二战后才出现的新问题, 因二战后北非移民对法移民的数量迅速增多, 法国的共和模式在同化这些宗教、人种和语言等相差甚远的移民群体时遇到了挑战。与当代法国移民成分不同, 两战期间的移民群体主要由欧洲移民组成。很多人认为欧洲移民被法国同化的过程很顺利, 法国也一直以欧洲移民顺利融入法国社会作为共和模式的优秀杰作。事实上, 移民同化问题早在两战期间的法国就已经出现, 并且也切实被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了。本文通过探讨两战期间在法的欧洲移民被同化的历程, 旨在说明同化问题出现的根源。笔者认为两战期间移民同化问题的根源在于法国社会对待移民群体的态度上——不宽容。

一、移民群体的特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由于法国人口伤亡惨重, 国家又急需人力重建, 移民已经成为医治战争创伤必不可少的良药。一方面, 法国政府积极引入外劳, 分别和邻近国家签订了招募协议, 引进大批移民。(1919-1920 年间, 法国分别与波兰、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条约引进外劳。)另一方面, 1924 年移民总协会 (La Soci   G  n  rale d'Immigration) 成立, 相当于劳动中介机构, 有偿地为雇主和企业招募外劳。法国出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考虑, 拒绝接收俄罗斯和德国移

民, 也拒绝法国殖民地移民。因此, 两战期间的移民群体主要以比利时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为主。两战期间移民群体主要有以下特征:

第一, 移民聚族而居, 产生聚居区。这一阶段移民的聚居区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自卫型的聚居区, 一种是“棚屋型”的聚居区。前者自 19 世纪末以来一直有之, 后者则形成于一战期间。自卫型聚居区主要是指移民群体为了自我保护自原形成的一种聚居区。比如在 19 世纪末, 意大利人在巴黎的第十区、第十八区和十九区、在洛林、在马赛, 西班牙人在波尔多都形成了本民族的聚居区。在这些聚居区里, 他们讲自己的语言, 保留了自身民族的文化习俗和饮食习惯, 过自己的民族节日。这种现象直到两战期间还继续存在。“棚屋型”聚居区最先发生在一战期间的殖民地居民身上。一战期间, 法国为了最大限度地召集人力, 迫不得已从北非殖民地抽调了大量劳动力运往法国。这些殖民地居民被安排在郊区的地方从事生产活动, 住在政府为之修建的棚屋 (baraquements) 里, 逐渐形成了一种聚居区。两战期间, 许多欧洲外劳也同样受到法国政府及其企业的安排被限制在郊区外从事生产。虽然他们住的不完全是棚屋, 但是这种聚居区形成的方式与北非殖民地居民相似, 因此笔者称之为“棚屋型”聚居区。这种聚居区的形成并非移民自愿所致, 而是法国政府和企业招募外劳时逐渐形成的局面。因为外劳的输入主要是为了满足大公司和大企业的要求, 这些企业和公司为了管理方便, 保持稳定的劳动力, 通常会把同一村落招募的外劳安排在同一地方工作和居住。波兰移民就是这种聚居群体的典型。20 年代, 法国矿业公司从鲁尔和波兰农场输入了成千上万的波兰人, 公司鼓励波兰人携家带妻地来到法国。他们为波兰人在矿区建造了“小波兰”, 并资助建立波兰语言学校、波兰文化协会和波兰教堂。这种安排符合公司的利益, 雇主也希望把波兰矿工和法国团体隔绝起来“安

收稿日期: 2007-03-02

作者简介: 谢璇娟 (1981-), 女, 广东深圳人,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 从事法国史方面的研究。

心”工作^{[1] (P270)}。同时期，洛林的冶金公司为了使意大利外劳更加稳定地代替法国战时失去的劳动力，雇主为移民工人建造了住宅区，鼓励家庭移民。1930年以前，一个稳定的意大利人社区形成^{[1] (P269)}。

第二，大多数移民从事繁重、肮脏和高危险性的工作。例如，比利时人多在化工和纺织业工作，而意大利人多是建筑工、采石工、矿工和冶金工，西班牙人则多在西南部的农村地区当季节工。据统计，当时有51%的移民在工业部门工作，只有4%的移民从事自由职业，其余的分别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等^{[2] (P20)}。总的来说，移民在法国多是刻苦耐劳、忍耐力极强的一个群体。他们愿意接受法国人不屑的工作和低工资，甚至不敢参加法国工人的罢工运动。外国人的这种勤奋和怕事总会引起法国工人的猜忌和不满：移民接受低工资导致雇主更加喜欢雇用外劳而不是本国劳动力，从而降低法国工人整体的工资水平；他们不参加罢工被法国工人认为是罢工的破坏者，有利于雇主。

综上所述，移民群体的特征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法国的需要而出现的，并非移民群体本身所具备的特性。如果说这样的特征给法国带来同化问题，法国政府及其企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艰难的同化之路

从19世纪中期开始，法国已有大量移民涌入，但是直到两战期间，移民的同化问题才被提出来。研究移民史的两位法国历史学者斯科尔和努瓦里埃都同样认为，移民的同化直到一战后才真正出现。斯科尔认为：“一战后的移民开始长期居住法国，并打算在法国扎根，这些新的移民开始了其漫长而又艰辛的融合过程。”^{[2] (P98)}努瓦里埃也同样说到：“移民的同化问题直到两战期间才确实被作为一个问题而提出来，换句话说，等全国各阶级融合成为现实之后才出现移民融合的问题。”^{[3] (P119)}

然而，移民的同化充满艰辛和痛苦，并非一帆风顺。这种曲折一方面来自移民本身对自己文化、宗教和语言等方面的惯性坚持，而更多的是来自法国社会方面的阻力。

第一，移民聚居区是阻碍移民群体融入法国社会的主要原因。如上所述，此时在法国形成了两种类型的聚居区，无论何种都不利于移民群体同化到法国社会当中，但法国在移民形成聚居区这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自卫型聚居区来说，如果法国社会相对宽容地对待移民群体，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促使移民群体融入法国，移民也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形成聚居区；对于“棚屋型”聚居区而言，无疑是法国政府和企业只着眼于眼前利益所致。

第二，在法国，语言不通是阻碍移民群体融入社会的重要因素。语言本来就是促进不同民族和文化族群相互交流的基本工具，对于移民融入法国社会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法国，法国人不但要求外人会说法语，而且还苛求他们的发音标准。因为法语对现代法兰西民族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尤其是精英阶层对他们民族语言的爱慕之情一直有之。远至中世纪，近至普法战争后，《最后一课》所抒发的民族感情就是通过肯定“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来表达的。但是，第一代移民群体多是不懂或者初通法语的人，很少能够和法国人沟通和交流。有些移民来到法国多年后，他们仍混合着两种语言使用。甚至意大利人，虽然意语被认为和法语相近的语言，但他们说法语仍不可避免地带有口音^{[4] (P123)}。在一个对自身民族语言如此自豪和苛刻的国家里，讲着蹩脚法语的人通常会成为法国人取笑和指责的对

象。因为在法国人看来，说不出标准的法语说明该移民对法兰西的伟大文化缺乏兴趣，更对法兰西这个共同体没有归属感。因此法国人对法语的执着造成了法语成为了阻碍移民融入的重要因素。

第三，社会地位低下是阻碍移民同化的根本原因。移民群体的社会地位低是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相结合导致的结果。经济方面来说，经济实力弱小是相对而言，并非指在整个社会阶层，而是指在同一社会等级当中的经济实力。比如同在中间阶层，也有稍微富裕和稍微贫穷的人，而移民的经济实力则多数处于该社会阶层的底层；政治方面，移民群体在法国缺乏政治上的话语权，更没有代表其政治权利的团体组织，因为绝大部分移民无选举和被选举权。以上两方面因素相互影响和制约。经济实力弱小导致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法国社会和政府对外国人政治组织的反感和严格控制阻碍了移民群体组建力量强大的政治团体，从而也无法保障其脆弱的经济地位。在当时社会等级还比较森严的法国，处在中间阶层的移民通常在整个法国中间阶层当中处于劣势，而作为工人阶级的移民来说，其处境通常不比法国工人好。在一个崇尚物质、摒弃宗教信仰的社会，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高低的很大程度源于其经济实力。但移民群体的经济实力如果过于强大，同样会引起法国社会的妒忌和排斥，犹太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政治话语权是移民一切权利的保障。如果说“聚居区”和语言这两个阻碍因素是针对第一代移民而言，那么此因素主要作用在第二、三代移民身上。麦克尔·沃尔泽论及少数族群在民族国家受到歧视和打击的原因时认为通常都是文化、经济和政治三个因素共同结合所致，而在移民文化和接纳国社会的文化出现冲击的相同条件下，移民可能处于的情况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少数族群的政治地位低，但经济富裕；另外一种则是政治地位低，经济状况也很贫穷。^{[5] (P57)}前者使少数族群处于危险的状况，后者则使之备受歧视和遗忘。政治地位低使移民群体几乎处于“无设防”的状态，无论其经济富裕还是贫穷，在民族国家永远得不到保障。这时期的法国大多数移民属于后者。法国小学是反映这种歧视和排斥根源的最佳场所。努瓦里埃根据当年作为第二代移民小学生的口述得出的结论是：移民的孩子通常在学校感到“被排斥在外”的原因根源于其社会地位。^{[4] (P169)}社会地位低，尤其是缺乏政治权利，使移民群体备受歧视和遗忘，从而也严重阻碍其得到法国社会的认同。

第四，宗教原因一度使移民群体在法国社会中无所适从。虽然大多数欧洲移民，包括法国人都是信奉基督教，但基督教在各国的教理和仪式上差别较大，而且一战后的法国已经成为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因宗教仪式和虔诚问题而导致移民处于受辱和被嘲笑的情况还是存在的。总的来说，天主教徒的外国人在法国的教堂感觉很不自在，因为他们感到法国人的宗教感和他们不一致。如波兰移民对天主教的虔诚不但得不到法国社会的谅解，还遭到嘲笑。在波兰当地，波兰天主教徒通常会实行夸张的宗教仪式，包括庄严肃穆的游行队伍，而在法国，神职人员考虑到共和国的世俗原则，对这些要求通常持谨慎态度；在波兰，整个教堂仪式当中人们都是站着的，座位只留给老者和残疾人，而在法国的教堂，法国的教徒都是坐着，但波兰教徒非常害怕坐下后占了一个不合适的位置，因此他们在教堂门前站成一队，阻塞了教堂的通道，从而引发了法国人的指责和嘲笑。

移民的被同化之路充满艰辛和曲折：就移民本身来说，有些移民并不愿意接受法国文化，但法国社会给他们施加各

种压力和贴上标签,使他们在法国的生活变得异常艰苦;有些移民尽管愿意融入社会,但仍然不被社会所接受,被认为还不够“法国化”(francisation),以至遭受歧视和嘲笑,甚至打击也是常有的事。法国社会对移民同化显得过于苛刻,政府也是绝对赞成同化移民。但在政府看来,移民是否接受同化是其个人的事情,政府很少参与其中。关于移民的同化问题,尽管也经常出现在社会讨论里,但政府压根没有出台过有关帮助移民同化的法令或法规。政府对移民同化的不作为和整个社会对移民同化的苛刻,皆导致移民同化历程的艰辛和曲折。移民同化并非移民个人的事情,就如阿列克·哈格里夫斯所言:“移民及其后代融入民族国家的程度不仅取决于社会经济过程、少数族裔群体的价值观和雄心,也取决于这个接纳国的大多数人民对待移民的态度和行为。”^{[6] (P149)}

尽管移民同化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20年代的移民确实呈现出融入法国的现象。

第一,入籍是移民渴望融入法国社会最为明显的表现。国籍是民族认同的政治形式,尽管它不能代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但对于入籍的人来说,入籍意味着他渴望长期居住在这片土地上,成为这个民族当中的一员,承担这个民族共同体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以便能享受到民族共同体所提供的各种权利。20年代在法外国人入籍的数量急剧上升^{[4] (P157)}。1927年8月国籍法修改前,入籍的模式仍然沿用1889年6月国籍法的模式。移民可以通过居住时间、出生地和与法国男性通婚获得国籍(外籍男性和法国女性通婚不但不能获得国籍,法国女性也会丧失法国国籍)。据努瓦里埃的统计,那些在法国居住历史最为“悠久”的移民群体入籍率也是最高的,比如当时的比利时人在1931年统计数据中的入籍率最高,而波兰人则最低。^{[4] (P158)}入籍的移民固然要为保卫这个国家参加军役,但“成为法国人”意味着增加大量的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比未入籍移民的境况好得多。

第二,混合婚姻数量激增表明移民开始融入法国社会。当然,混合婚姻并不仅指法国人和外国人的通婚,还包括在法国的其他外国人之间的通婚,然而,这时期的混合婚姻主要以法国女性和外籍男性通婚为主。20年代来到法国的外劳重复了共和国早期移民人口的特征:以青壮年单身男性为主。但新时期出现了新变化。由于大战过后大批法国男性死亡,从而导致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生的一代法国女性被夺去很多男性配偶。因此,这个阶段的法国女性和外籍男性通婚直线上升,1930年混合婚姻数量达到了20年代的制高点,大约有12万左右。^{[3] (P125)}其中以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居多,这也一定程度解释了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主要因素在于在法国居住的时间长短,同时期的新进移民波兰人的混合婚姻数量就少得多。在1927年8月国籍法修改之前,法国女性一旦和外籍男性通婚,也就失去其原有的法国籍,从而也导致法国失去了不少人口。这也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当时外国男性之所以和法国女性通婚并不是为了获得法国国籍,而是有打算在法国安家落户的心态。无论通婚的最初动机如何,混合婚姻必然促进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和语言的人相互了解,有利于移民融入法国社会,同时也有利于促使法国社会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宽容。

第三,职业是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最初和主要场所。移民工人来到法国的目的就是打工挣钱,因此职业的性质和工作场所对大多数移民融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职业途径的融入主要取决于这份职业与法国人沟通和交流的机会,或者与法国人接触机会的多寡。斯科尔细致地考察了20年代有利于移民融入法国的职业,它们分别是:矿工、冶金业、机

械工业和化工等,还有在杂货店或者手工作坊工作的移民。^{[2] (P98)}这些职业的共性是和法国人合作和交流的机会多,既有利于提高移民的法语水平,也有利于双方文化和生活习惯的相互影响。与此相反,那些水泥工、石膏工、修鞋匠等都是“各自为营”,孤立工作,因此其融入社会的程度和速度显然不比前者。

第四,共和学校尤其对第二代移民融入法国社会起到非比寻常的作用。第二代移民的定义比较复杂,事实上,根据1889年的国籍法来看,第二代移民成年后可以获得法国国籍,成为法国人。然而,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移民的子女还是移民,不管其来源地是欧洲还是非洲。因此,第二代移民的定义并非从国籍或者出生地的角度来看,而是从其最初的社会化角度来定义^{[4] (P288)},即第二代移民最初受教育的环境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在家庭,他受到的是父母来源国的文化和语言等方面的熏陶;在学校,他必须学会法语、学习法兰西的悠久历史,接受共和主义的价值观。学校对第二代移民的影响是占绝对优势的。他们从五、六岁开始上小学,从对法语的一字不通到其他法国小孩一样,必须通过学校规定的12至13个证书考试。因此,学校被时人称为“大熔炉”(le creuset),“它可以使各种民族的人锻造造成统一的成色优质的金属法郎”。^{[2] (P100)}第二代移民和第一代移民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对法兰西民族的认同感上:对于第二代移民来说,“祖国”就是法国;而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祖国”就是其来源国。第三共和国时期小学教育最初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使之接受共和国的价值体系,成为“共和人”。至于想通过小学教育改变自身的阶级状况的机会是非常之微小的。因为当时法国的中学教育尚未普遍化,能攀上中学教育的大多是法国中间阶层的男孩,对于移民乃至工人阶级的孩子而言,除非其学业非常出色,一般很少能继续读书,文化水平较低的第二、三代移民通常处于社会底层。^{[7] (P563)}

三、结语

两战期间的移民同化问题主要是针对欧洲移民而言。虽然几十年过去了,至今的欧洲移民得到了法国社会极高的认同程度,但是其最初接受同化的痛苦历程不应被忘却。记住历史是为了追本溯源,寻找出“问题”产生的根源。从两战期间欧洲移民被同化的历程可知,“问题”的根源并不完全在移民群体身上,而更多地在法国社会对待移民群体的态度上——不宽容。因此,面对当今北非移民的同化问题,法国社会应该吸取早年同化欧洲移民的经验教训,树立一种更加宽容和开放的态度。

参考文献:

- [1] Camille Guerin-Gonzales and Carl Strikwerda, The politics of immigrant workers—labor activism and migr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since 1830 [M]. Holmes and Meier, 1998.
- [2] Ralph Schor, 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en France de la fin du 19^e siècle à nos jours [M]. Armend Colin / Masson, Paris, 1996.
- [3] Gérard Noiriel, Population, immigration et identité nationale en France de 1830 à nos jours [M]. Hachette Education, 1992.
- [4] Gérard Noiriel, translated by Geoffroy de Laforcade, The French melting pot—im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June, 1996.
- [5] Michael Walzer, On tolerance [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6] Alec G. Hargreaves, Immigrati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contemporary France [M]. Routledge, November, 1995.
- [7] 雷吉娜·佩尔努. 法国资产阶级史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